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人文与社会译丛

传统的发明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英国]E.霍布斯鲍姆 T.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传统的发明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英国]E.霍布斯鲍姆 T.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的发明 / (英)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E.), (英) 兰格 (Ranger, T.) 编; 顾杭, 庞冠群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3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SBN 7-80657-566-9

I. 传... II. ①霍... ②兰... ③顾... ④庞...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IV. G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402 号

Copyright © 1983 by E. J. Hobsbawm, Hugh Trevor-Roper, Prys Morgan, David Cannadine, Bernard S. Cohn, Terence Rang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18号

书 名 传统的发明
编 者 [英]霍布斯鲍姆 兰格
译 者 顾杭 庞冠群
责任编辑 胡传胜
原文出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66-9/I·496
定 价 21.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撰稿者:

大卫·卡纳迪恩(David Cannadine):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作包括《领主和地主:贵族统治和城镇,1774—1967年》(1980年)、《英国贵族统治的衰亡》(1990年)。

博纳德·S.科恩(Bernard S. Cohn):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很多关于历史与人类学的相互影响和印度社会研究的论文。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经济与社会史荣誉退休教授,《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始人之一。他著述甚丰,其中有《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进程、神话与现实》(1990年)。

普赖斯·摩根(Prys Morgan):

斯旺西的大学学院历史讲师。他已出版了大量有关威尔士的著作,并参与了很多有关威尔士历史的书籍的撰写。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

牛津大学罗兹种族关系教授,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他著有《非洲宗教历史研究》(1972年)和《东非舞蹈与协会》(1975年)。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

格兰顿的戴克爵士,1980—1987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1957年起曾任牛津大学历史钦定讲座教授。

目 录

- 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
-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
…………… 休·特雷弗-罗珀(18)
- 第三章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
…………… 普赖斯·摩根(54)
- 第四章 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
明”,1820—1977年…………… 大卫·卡纳迪恩(129)
-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
…………… 博纳德·S. 科恩(216)
- 第六章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 …… 特伦斯·兰杰(270)
- 第七章 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338)
- 索 引…………… (396)

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 1932 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将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依照定义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

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仍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 3 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其重要性低一些)在于,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之间的差异,后者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尽管它偶尔可能会有。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最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这种惯例和常规的网络并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因为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都是技术性的，而非思想意识性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们属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简化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此外为了满足变化了的实践之需要，它们能被迅速调整或是放弃，而且还常常考虑到任何实践随着时间推移都会获得惯性，同时已与之紧密相联的人们对任何革新都会强烈抵制。这也关系到它们存在于其中的已知的游戏“规则”或其他社会互动形式，或其他任何具有实际基础的规范。当它们与“传统”相结合而存在时，差异就易于辨认了。骑马时戴圆顶礼帽变得有实际意义了，就像骑摩托车的人戴防撞头盔或士兵戴钢盔一样；戴一项特别款式的圆顶礼帽，配以红猎装，则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若并非如此，4 那么改变猎狐者的“传统”服装将和在军队（相当保守的机构）中改用不同形状的头盔一样容易，只要后者能被证明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的话。事实上，可以认为“传统”和实践中的惯例或常规是反向相关的。正如自由派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通过宣称古代希伯来人出于卫生原因而禁食猪肉，饮食禁律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此时，“传统”就显示出了其不足的地方。相反，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没有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我们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创造此种仪式和象征体系的确切过程尚未被史学家很好地加以研究。其中

很多还模糊不清。当“传统”是由一位创始人有意发明和建构时,如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创立的童子军,那么它可能是最清楚的范例。而在那些官方组织和安排的仪式中,例如纳粹符号的建构和纽伦堡纳粹集会,它可能比较容易被追溯,因为它们可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最难考察的可能是如下的传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发明的,且又一定程度上与私人团体相关联(这就意味着整个过程被完整记录下来的可能性较小),或者在诸如议会和法律工作中的一段时期内曾是非正式的传统。其困难不仅体现在材料上,而且还体现在技术上,尽管现在既有长于象征和仪式研究的深奥学问,如纹章学和礼拜仪式研究,又有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瓦尔堡历史学派。但不幸的是,对于研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通常都是陌生的。

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可能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在过去200年里,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新传统的转瞬即逝的仪式化活动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集中表现。顺便提一下,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晚近的“现代化”理论不同,这意味着仪式化活动并非仅限于所谓的“传统”社会之中,而且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它们的地位。广义上说确实如此,不过还应注意形成进一步的假设:首先,共同体和权力结构的旧有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变得不合适,并进而迅速变得行不通;其次,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

传统的产生。

对于旧用途的调整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具有确定的功能,并与历史、仪式风格及实践相关联的旧机构可能需要这样调整:面对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挑战的天主教会,主要变化发生在信仰的组成上(例如世俗虔诚和教士成员明显女性化)^①;面对征兵制的职业军队;像法庭这样的旧机构如今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运作,有时在新环境中它们具有一些变化了的功能。所以一些机构虽然享有名义上的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已变得非常不同了,例如大学。因此巴恩森^②根据大学变化了的学术特点、学生人数增长的时代、缓解了城镇与大学师生紧张关系和学生闹事行为的大学资产阶级化、大学之间自由流动的新制度、学生社团和其他组织的不断变化,分析了1848年以后德国大学中大批学生突然离开学校(由于冲突或是示威活动)这一传统行为为何迅速衰落的原因。^③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新颖之处就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自己装饰成古老的。

- 6 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

① 例如 G. 蒂翁:《18—20 世纪的比利时修道士:计量分析》(G. Tihon, 'Les religieuses en Belgique du XVIIIe au XXe siècle: Approche Statistique', *Belgisch Tijdschrift v. Nieuwste Geschiedenis/Revue Bel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vii [1976]), 第 1—54 页。

② 卡斯腾·巴恩森:《德国大学师生的校际迁移与霍亨索伦王朝》(Karsten Bahnson, *Akademische Auszüge aus deutschen Universitäts und Hochschulorten [Saarbrücken, 1973]*)。

③ 18 世纪有据可查的这种大批离去有 17 次,1800—1848 年有 50 次,而 1848—1973 年只有 6 次。

杂语言常常是现成可用的。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它本身也是一种较早被发明出来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传统)。因此鲁道夫·布劳恩^④对伴随着19世纪现代联邦制国家形成的瑞士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了精辟分析,布劳恩曾受过关注此类研究的学科(民俗学)的良好训练,并且身处一个其现代化进程并未因与纳粹罪行相关而受挫折的国度中。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传统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学校老师写的),并被加到其内容是爱国进步的(“祖国,祖国,多么响亮的声音”)合唱曲目之中,不过后者也包含了来自宗教赞美诗的强烈仪式成分。(这种尤其用于学校的新曲目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联邦歌曲节的章程——这不是使我们回想起了威尔士诗歌大会(eisteddfodau)吗?——宣称它的目的是“发展和改进人们的歌唱水平,唤起对上帝、自由、祖国的更崇高的情感,促进艺术和祖国的朋友间的联合与友谊”。(“改进”一词体现了19世纪进步思想的特点。)

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钟、舞台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

^④ 鲁道夫·布劳恩:《19—20世纪农村工业的社会、文化演变》(Rudolf Braun, Sozialer und kultureller Wandel in einem öndlichen Industriegebie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Erlenbach-Zürich, 1965]),第六章。

7 巴洛克形式的庆祝、展览和盛大仪式无疑又在这一新的节日框架中重现。正如巴洛克庆祝中国家和教会在更高层次的融合一样,从这些新形式的合唱、射击与体操活动中也出现了宗教和爱国成分的结合。^⑤

在这里不可能探讨新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旧材料,以及多大程度上它们将不得不发明新的语言或工具,或是扩展旧的象征词汇以突破原有限制。不过显而易见,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例如或是通过半虚构(如包迪西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⑥),或是通过伪造(如奥西恩、捷克中世纪手稿)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同样明显的是: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國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国歌(其中 1740 年的英国国歌似乎是最早的)、国旗(仍有很多是依照 1790 年至 1794 年间形成的法国革命的三色旗而演化形成的),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如官方的玛利亚娜(Marianne)和日耳曼尼亚(Germania),或非官方中的约翰牛、瘦弱的美国佬山姆大叔和“日耳曼人米歇尔”之类的卡通定式。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有时甚至清楚地

^⑤ 鲁道夫·布劳恩,前引书,第 336—337 页。

^⑥ 包迪西亚(Boadicea)是古不列颠爱西尼人王后,在其丈夫死后,领导反罗马的起义;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古高卢人的领袖,公元前 52 年领导过高卢人反对恺撒的起义;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 the Cheruscan),古日耳曼人部落首领,曾打败罗马军队。这三人分别被英、法、德三国看做是自己的古老的民族英雄。——译注

体现于真正古老的传统主题中。如果我们接受劳埃德的观点^⑦,那么在17世纪英国民间圣诞颂歌就不再有创新,而是被瓦茨-卫斯理式(Watts-Wesley)的赞美诗集中的颂歌所取代,不过在许多类似于“始初循道宗(Primitive Methodism)”这样的乡村宗教中,还能看到对这些颂歌的通俗化的修改。然而颂歌是最早被中产阶级采集者复活的民间歌曲,它们进入到“新的教会、团体和成年妇女业余学校这样的环境中”,由此又通过“怀着古老的获取报酬愿望的街角歌手或是声音嘶哑的男孩的挨家挨户的歌唱”传播到新的城市大众生活之中。在此意义上,“上帝赐你们常乐,诸位先生”这句话非但不旧,而且有了新的意义。此种断裂甚至在这样的运动中也能看到:这些运动有意称自己是“传统主义者的”,并且对那些通常被看做是历史连续性和传统之栖身处的团体,如农民,具有吸引力。^⑧事实上,维护或是恢复传统的运动的出现,无论其是“传统主义者的”或是别的什么,都已显示了这种断裂。在浪漫主义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已习以为

^⑦ A. L. 劳埃德:《英国民歌》(A. L. Lloyd, *Folk Song in England* [London, 1969 ed.]),第134—138页。

^⑧ 这应该与实际证明确实已经衰落的传统的复活相区分开来。“(1900年左右)农民恢复他们旧的地区服装、民间舞蹈和类似的节日庆典中的仪式,这既没有资产阶级特色,也没有传统特色。表面上它可以被看做是对正迅速消失的旧文化的怀旧心理,但实际上它是阶级认同的体现,通过它,富裕的农民就能不仅在横向上与城镇人保持距离,而且在纵向上与佃农、工匠和劳工区分开。”见帕勒·奥弗·克里斯蒂安森:《农民适应资产阶级文化? 丹麦农村的阶级形成和文化再定义》(Palle Ove Christiansen, 'Peasant Adaptation to Bourgeois Culture? Class 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definition in the Danish Countryside', *Ethnologia Scandinavica* [1978]),第128页。另见G. 刘易斯:《农民、农村变革和保守的平均地权论:世纪之交的下奥地利州》(G. Lewis, 'The Peasantry, Rural Change and Conservative Agrarianism: Lower Austr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st & Present*, no. 81 [1978]),第119—143页。

常的这种运动,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除非在想像上为了古代生活的偏僻角落而建立人类的自然庇护所),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另一方面,真正传统的力量和适应性并不因为“传统的发明”而变得迷惑不清。在旧方式依旧起作用的地方,传统既不需要被恢复,也不需要被发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19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19世纪兰开夏郡的托利党工厂主(与自由派工厂主截然不同)在运用这些旧纽带来获得上的成功表明它们仍能被使用,即使是在工业城镇的新环境中也是如此。^⑨ 虽然前工业的方式对于已相当革命化的社会具有长时期的不适应性这一点不能被否认,但是不能与那些由于人们短视地拒绝旧方式而产生的问题相混淆,这些人把旧方式看做是进步的阻碍,或更糟糕,是进步的顽固敌人。

这并不妨碍革新者形成他们自己的被发明的传统,共济会的实践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不过,对于非理性主义、迷信和使人回想起黑暗过去(如果不是确实起源于它的话)的习俗活动的普遍敌视,使得那些启蒙运动真理的狂热信徒们,如自由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会接受任何旧的或新的传统。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在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

^⑨ 帕特里克·乔伊斯:《19世纪后期兰开夏郡的工厂政治》(Patrick Joyce, 'The Factory Politics of Lancashire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Journal*, xviii [1965]),第525—553页。